

张武龄家族的迁移与传统家族的现代转型〔*〕

○ 王 欣^{1,2}

- (1.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 文法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22;
2. 安徽大学 历史系, 安徽 合肥 230039)

〔摘要〕张武龄家族于民国初年举家由合肥迁移至上海。迁移后在居住地、家族组织结构、家族功能、家族成员的身份以及受教育形式和内容上都呈现不同的结果与表现,伴随迁移,张武龄家族完成了从偏安内陆一隅的显宦之后向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家族的转型。这一转型既体现出传统家族向现代性的趋近,也有对传统的继承,转折迹象明显,呈现出家族开放包容的心态。

〔关键词〕张武龄家族;迁移;现代转型

1912年^{〔1〕},时年二十三岁的张武龄携全家从安徽合肥迁往上海,1917年再迁往苏州。中国传统观念安土重迁,认为“小人之情,安土重迁,宁就饥馁,无适乐土之虑。”^{〔2〕}一个家族不会轻易抛却故乡田园,选择离乡背井。张武龄家族缘何于民国初建时举家搬迁?迁移后的家族构成与表现呈现出哪些新的特点?晚清民初,伴随着西方的冲击,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模式都在发生变化,面对相去甚远的政治制度、伦理观念、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各个阶层的人群不得不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作为传统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在家国同构的社会格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士绅阶层,迁移是张武龄家族转型的重要节点,也是传统家族在充满无数可能性的大时代中的自变与应变之举。现拟就张武龄家族迁移的因由进行分析,并进一步考察其家族迁移后的结果,从而对传统家族的现代转型问题进行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作者简介:王欣,文学硕士,安徽广播电视大学文法学院讲师,安徽大学历史系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文学与地方家族史。

〔*〕本文系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合肥张武龄家族文学研究”(SK2013B197)的成果。

一、大背景与小格局：迁移的因由

（一）时局与家族中兴

19世纪中期太平天国和捻军动乱迭起，合肥宗族大多聚族而居、势力强大，为自卫计筑圩寨、兴团练，因而虽“皖省为发、捻蹂躏殆遍”，但合肥可恃民团苦战从而得以独全。^[3]清政府囿于八旗、绿营战力薄弱，借助地方团练和乡勇的力量对抗叛乱，李鸿章、张树声、刘铭传等将领累积战功，淮系集团作为新兴的精英力量崛起。张武龄的祖父张树声是其中较早离开行伍步入宦途的，后来官至督抚，是淮系集团中仅次于李鸿章的二号人物，也是其家族中兴一代的代表。淮系崛起后，淮系主要成员在家乡各自广置田亩，“阡陌相接，绵延数十里者往往有之”，^[4]形成了合肥地方的数支望族。经历了长时间的战乱，加上安徽本就是多灾之地，在清朝最后十年间（1901-1911），安徽人口锐减，千余饥民聚集蜂拥至富绅家行劫的事件，在全省各地频现。武昌起义后，全国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安徽的光复之路异常曲折：1911年10月31日革命党吴旻谷率标炮营进攻省城安庆，次月8日安徽咨议局宣布独立，之后历经大小战役，省内各地除亳州外均告光复，半年内都督任上更迭数次；与此同时，袁世凯亲信倪嗣冲等人屯军周口，积极布置伺机入皖，1912年1月，倪嗣冲攻占阜阳，大肆屠杀，后一路向南驱赶革命党，省内治安纷乱，民生凋敝。^[5]张武龄家族作为清廷显官之后，不可避免处于各种政治势力的角力之中，处境尴尬。

（二）格局之困

晚清民初是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渡时期。晚清的维新思潮从政治改革和思想启蒙的层面提出了政治民主、发展实业、平等自由的新思想，以自上而下的角度，助推了中国近代化观念的形成。经过几十年的积聚演变，伴随着社会形态、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原有的价值规范被打破，新的社会文化与社会价值观启动。传统社会的等级观念、崇尚礼仪纲常的价值观逐渐弱化，社会观念中的民主性开始彰显，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呈现出西化趋向，社会关系从严守等级秩序到追求平等。虽然同时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发展态势，但建立富强国家、挣脱传统束缚、肯定人性欲望、追求平等自由，是其中鲜明的主线。

安徽地处华东腹地，经济结构偏传统，其时仍处于传统小农经济生产的阶段，工商活动也仅维持小范围内自足，囿于政府功能、自然环境、交通状况以及观念习俗等诸多不利，安徽在近代的发展远不及沿海各省份，“对于适应现代的急剧变迁，似无特别有利之处”^[6]。晚清民初，传媒业发展迅猛，引领新思维，但在安徽，民众多不知报纸为何物，或欲读无报，陈独秀在1904年《安徽俗话报》创刊号中亦描述过当时安徽信息落后、无报可读的情形：“别说是做生意的，做手艺的，就是顶刮刮读书的秀才，也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坐在家里，没有报看，好象睡在鼓里一般，他乡外府出了倒下天来的事体，也是不能够知道的。譬如庚子年，各国的兵，都已经占了北京城，我们安徽省徽州颖州的人，还在传说义和团大

得胜战。”^[7]此外,安徽近代教育发展缓慢,缺乏智力资源,虽然 20 世纪初也有不少安徽青年留学海外,但学成后回家乡效力者寥寥。安徽民风保守、重本抑末,民众大多安于现状,不喜改变,因而相较于沿江沿海开埠较早的地区,虽然在形式上也有各式各样的现代性行为,但均不免沉滞抑敛。

张家中兴一代的张树声、张树珊为后世积累了大量财富,张家在张老圩的田产“年收租总计四万多石”^[8],在张新圩的田产则遍布舒城、庐江、三河等地,年收租数万石,秋后佃户送租的独轮小车熙攘往来,日积月累将青石条路心压出一两厘米深的沟陷,除此之外张家在合肥、南京、苏州、上海、天津等城市均持有相当规模的商号和市房。祖产的丰厚给家族带来了安逸的生活,也滋生了“懒散、奢靡”的风气。圩内常成日以棋牌为乐、不问世事,“纳妾的纳妾,吸鸦片的吸鸦片,赌博的赌博,张家的书香气息越来越淡”^[9]。张武龄出生后即被送至在重庆川东道任上的父亲张华奎身边,八岁父逝扶柩还乡,随母亲居于城中龙门巷的张公馆。张武龄一生未纳妾,也无不良嗜好,喜读书报,对新文化、新信息求之若渴,但由于辈份低年纪轻,对于家族事务并无发言权,对于不合时宜的家风也无力做出改变。1906 年,张武龄与扬州世家之女陆英成婚,婚后陆英主理家政,但大家族人员众多,关系复杂,自然困心衡虑,加上对于下一代子女教育的考量,张武龄做出迁移的决定自然不难理解。

由此可见,近代化语境中的大背景与小格局的冲突在一定意义上促成了中国传统家族的裂变与转型。张武龄家族迁移的直接动因虽然来自于张武龄对狭小的地方以及家族格局的不满,有其偶然性,但与社会近代化的发展主流是相契合的。

二、迁移的结果与表现

张武龄家族迁移后,其家族构成与表现与迁移之前相比有哪些异同? 现从居住地、家族结构、成员的身份、子女教育等方面逐一展开:

(一) 居住地的选择

传统家族大多聚族而居、或者同住一乡,或者同占一镇,即便是小有迁徙,也不会出数百里之外。张家自明代由江西迁至合肥,“至公曾祖讳从周,居周公山。……人遂称周公山张氏,族浸以大……充然巨乡硕望矣。”^[10]数百年间其家族聚居于斯,生息繁衍,除少数为官外地就任以外,罕有迁移。

张武龄为什么会选择上海作为居住地? 耶鲁历史学家金安平就曾提出过这一疑问。上海作为中国其时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拥有丰富的资源和众多的可能性。上海是古典戏曲与新式话剧演出频次最多、最集中的城市之一;也是彼时中国传媒业与出版业最发达的城市,张武龄喜看书读报、酷爱戏剧,无论基于兴趣爱好的契合,还是上海自身的开放性和多元化,对于张武龄来说,上海都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张武龄家族迁沪后最早居住在公共租界麦根路麦根里(今淮安路、康定东路),次迁至卡德路法奥里(今石门二路),最后迁到铁马路图南里

(今河南北路)。民国成立未几,新政府尚且稚嫩,从中央到地方,军阀当道,社会呈现出一片无序混乱的状态,但在上海的租界内却相对平和繁荣。即便如此,张家的孩子们这个时期并未出门上学,只是聘请老师到家里教习功课,连在院中玩耍时,都要大门紧锁,并由看门人在几步之外监守。迁沪后家中添丁进口,陆英又诞下一女三子:张充和(1913年出生,后由叔祖母识修带回合肥抚养,1920年回到苏州家中)、张宗和(1914年出生)、张寅和(1915年出生)、张定和(1916年出生),^[11]租界内洋房寓所日显局促,加之后期随着租界内各国的分治,缝隙效应增强,租界管理的边缘也成为治安的死角,持械盗窃等案件的“增加之速,诚有一日千里之势。”^[12]张家在上海的居所曾多次被盗。出于对治安、居住环境的考量,张家于1918年再次动迁至上海邻近、同样是江南富庶之地的苏州。苏州与张家颇有渊源,张树声曾于江苏巡抚任上,在苏州重修沧浪亭、浚治太湖、建紫阳书院,留下许多印迹。张家迁苏州后居住在朱家园寿宁弄八号的一所中式院落,与现代公寓洋房相比,世家出身的张武龄、陆英夫妇更习惯的是古典式的居住环境,张武龄在合肥城中的龙门巷张公馆,陆英成长于扬州东关街之冬荣园,均为园林式的古典住宅。上海苏州两地相近,张武龄每年都要携家人到上海看戏或购书,在新世界饭店住一两个月或更长时间。迁苏既满足了张武龄对于新资讯的需求,又符合其家族古典式的居住习惯,更兼顾到子女的成长空间。张武龄的子女成年后纷纷走出家门,随着事业的发展,往往在当地安家落户,回苏州居住的越来越少,居住地日渐分散,传统的聚族而居、少有迁徙的家族居住情形难以复现。时至今日,张武龄家族成员的居住地更为分散,境内主要分布在江苏、北京、上海、贵州、安徽等地,境外在美国、比利时、法国等国家也有成员定居。

(二)家族组织结构与功能的变化

在传统聚族而居的生活环境下,虽然也以人口繁衍、分家析产的形式扩充或重构宗支规模,但家族结构中的世系结构、行辈结构、婚姻结构基本均呈现出稳定的状态。张武龄的曾祖张荫谷共生九子,张家后世习惯称“老九房”,多聚居于合肥肥西聚星乡的张老圩。“圩子…过牌楼是五进正厅,每进十五间,分东、中、西三个大门,内分正大门、客厅、书房及张树珊灵堂。张氏兄弟八人,在大厅背面建造内室,各房单成一个小院落”^[13],从张老圩的建筑意图看即是为满足传统家族累世聚居的目的。迁移前的张家支脉繁衍、直系与旁系共同生活,是典型的传统复合式家族。作为封建社会的最基本单位,传统家族承担了包括组织、协调、教育、文化与互助在内的诸多功能。随着旧政权的覆灭,家与国的概念分离,家族在维护正统、固化儒家封建伦理思想与观念方面的功能逐渐弱化。与此同时,经济环境的变化导致了家族书院的解体,对族中子弟的资助减少。原有家族秩序的破坏导致传统家族的文教、互助功能也因此失去支撑。

张武龄迁沪时带走的主要是张武龄这一支三房的家族成员,包括张武龄陆英夫妇、尚处幼龄的三个女儿: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武龄的妹妹张昭龄、堂弟以及五位年老孀居的长辈。从而形成以张武龄与夫人陆英为核心,成员以直

系为主、关系相对简明的单一家族,家族规模呈现由大到小的简化趋势,简化后更接近现代家庭的核心化家族结构。传统家族成员的言论、行动、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要受到族长、长辈等大家族权威的影响与控制,受到亲族群体的制约与监督。迁移后随着家族结构的简化,家族对其成员的控制力相对减弱,成员有机会逐渐步入社会,从事更具现代性的职业,家族的社会功能得以提升,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更趋向独立平等。这一点在张武龄对子女婚姻的态度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张武龄和陆英婚姻的缔结应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基于张家与陆家世交关系基础上的传统式婚姻。但从其子女婚姻来看,长女张元和嫁昆曲名伶顾传玠,次女张允和与周有光,三女张兆和与沈从文,均是自由恋爱结合,并且顾传玠是当时社会地位不高的戏子,周有光家境败落,沈从文还只是个普通的教员,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门当户对之合,对此种种,作为家长的张武龄都给予了极大的空间与尊重。

(三) 家族成员身份地位的变化

家族成员身份地位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张武龄由传统士绅向教育家、知识阶层的转变;二是家族中女性成员的地位变化。

张武龄迁移后,基本脱离了经营土地的老一套,开始为自己人生寻找新的支撑点。1921年,张武龄在苏州创办了乐益女子中学。张武龄蓄志创办女子学校,意在提供给女性更多受教育的机会,致力发展女权以实现男女平等。女子教育从1907年清学部奏定的《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开始,有了合法的地位并取得一定的发展。乐益女中“以适应社会之需要”为宗旨,取“乐观进取,裨益社会”为意。从民国时期苏州、上海报刊上所登乐益女中的招生简章看,从学生收费来看,分通学、半膳、寄宿三种形式,收费从二十四元到六十元不等,每学期学费不一,大致如上,另外还招收一定比例的免费生。乐益女中每年所付教员的薪资达五千余元,办公及其他支出两千余元,平均年收入不足两千元,收支不仅不平衡,还要贴五千元。张武龄自奉甚俭,“但是凡学校之所需,无不竭力予满足”。据校董韦布估算,从1921年到1937年之间,乐益女中的所有开支在二十五万元以上,而这些费用均由张武龄所出,“其间始终未有一丝一毫是受惠于校主以外的第三者的。”^[14]为此,张家在合肥的宗亲嘲笑张武龄:“这个人笨得要死,钱不花在自己的儿女身上,花在别人的儿女身上。”^[15]张武龄坚持独资办学,也是基于对学校独立办学理念的坚持。乐益女中所聘请教师中不乏侯绍裘、张闻天、叶天底、匡严明等激进人士,学校风气开明,具有强烈的时代责任感,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时,乐益女中停课并通过义演进行宣传与募捐活动。虽然张武龄未如祖父一样走科举仕宦之路,但他所开创的教育文化事业直接作用于社会,不再经过政治权力的中间环节,建构起新式知识阶层的担当,完成了由士绅向教育家这一近现代意义上知识阶层身份的转变。

家族中的女性成员地位的变化表现在各项权利与男性成员逐渐对等,在家族事务中影响力扩大,开始谋求职业发展和社会话语权。张家突破了传统家族

中男尊女卑的地位桎梏,在教育、婚姻、职业和社会参与等方面都为家族女性提供了与男性对等的空间,在女性地位发展不平衡的近代,具有积极的意义。张武龄的四个女儿都接受了良好的家族教育,她们和弟弟们一起开蒙,之后进入新式学校学习,张武龄会根据她们的兴趣,尊重她们在所学专业上的选择。由于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张家的女性走出家门走向社会之时,表现出较强的女性自我意识。张武龄二女张允和从1936年10月开始主持编辑《苏州明报》中妇女版专栏,同时作为苏州妇女整理委员会委员,她为专栏多次撰文,探讨女性的地位与处境,鼓励女人要积极参政。此后张允和还主编过《中央日报》的副刊《妇女与家族》,这时期所撰写的《女人不是花》等文流露的女性观到今天看来都不过时。四女张充和活跃于昆曲曲坛,与梅贻琦、张大千、章士钊、沈尹默等名士常有雅集。1943年,民国政府教育部所设国立礼乐馆成立,张充和受聘负责国家礼乐的重新整理与编选,时抗战正酣,张充和常通过昆曲演出的形式进行劳军募捐,展现了新女性的社会价值。

(四) 家族成员教育的变化

张家历来重视教育。张树声认为“书院之设关乎教化者綦重”^[16],将发展文教作为任上的重要一项。张树声在抚苏期间重修紫阳书院,在两广总督任上办实学馆,并与刘铭传、周盛波、丁寿昌等同乡望族在合肥创办肥西书院,“同捐市房田亩,以备肄业生童膏火之资教化子弟乡里。”^[17]受此影响,张家在家族成员的教育上更是毫不松懈。张华奎于光绪壬午年中举时,其弟张华轸县试未中,被责徒步二十公里回家,从偏门入,长跪祖宗牌位前谢罪。虽然目的是为科举高中以支柱门户,但也可见张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张家家境富裕,科举未废前,多不惜重金延聘名师,在家中开设教馆,教育子弟研习传统经典,这种传统的延师授业的教育形式在迁移后仍有保留,张武龄长女张元和《慈父》一文中记:迁沪后仍延“陈先生在家教授、在苏州时则有扬州人于老师教文言文,……父亲自《古文观止》、《文史精华录》等书中选出文章,交郑谦斋用大张纸以毛笔写讲义给我们读。”^[18]迁移之初,张武龄的子女处于开蒙阶段,延师授业的教育形式虽未变化,但教育科目内容广泛:除了《三字经》《龙文鞭影》《唐诗三百首》等传统启蒙经典外,还设置了历史、数学、科学常识、体育等科目。“安徽的王梦鸾先生,教历史、地理及当代评论家所写的白话文作品,女老师吴天然来自苏州,她负责教授算术、常识、体育和跳舞,以及一些简单的英语单词。”^[19]张武龄还为孩子们布置了每日练习大小楷、每周做一篇白话文、做一篇文言文的任务,文白均不偏废。张家四姐妹的中学教育在父亲所开办的乐益完成,其他成员多就读于寄宿学校,再升入大学。张元和读大夏大学,张允和、张寅和读光华大学,张兆和读中国公学,张宗和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张宇和读金陵大学,张寅和、张宇和都有留日的经历。留守合肥未随父母迁移的四女儿张充和的早期教育与其他成员略有不同,她的历任老师中朱谟钦授学的时间最长,朱谟钦偏好经史,注重对传统经典的研习,自己选择教材,此外还以颜勤礼碑的拓本为基础让充和习字。

1934年,张充和以语文满分、数学零分的成绩被北京大学破格录取。

传统家族期望通过族学、书院等被认可的教育形式在科举中获得向上的动力。近代以来科举日渐式微,1905年科举制被废止,张武龄家族在中西学激烈振荡的时代,并没有不知所措,而是从容地将现代教育纳入到家族教育中来,学习内容也从开蒙的传统经典转变为现代学科体系下的知识系统,接受新学制、更新学习内容,家族成员所学专业细化,有英语、文学、音乐、社会学、生物等等,学科门类十分广泛。教育成就了家族成员的身份、职业,改变了他们的思想观念、生活与行为方式,进而塑造出兼具古典气质与现代思维的个体。教育也不再是整个家族的集体行为,而更具有个体性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在张武龄家族凭借着新的教育形式和教育内容完成自身由旧到新的转换过程中,并未放松对传统经典的学习,但目的已不是科举考试,而是为了正身明理、陶冶性情。由此可见在家族成员教育问题上,既有对传统经典的坚守,也有对新知识的包容,转折过渡的迹象非常明显。

三、家族转型中的现代性

从迁移的整体语境看,张武龄家族在近代化的冲击下,主动选择求变,符合家族自身发展的利益;从结果和表现上看,迁移造就了其家族发展的开阔空间,促成了与传统中不合时宜因素的剥离,是家族应对外部世界变化的积极之举,也恰恰是促成家族转型的重要契机。张武龄家族借助迁移,完成了从偏安内陆一隅的显宦之后到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家族的转型。这一转型与现代性存在着互动关系:现代性因素的积累是家族转型的前提,家族的转型又给现代性存在和延续提供了支撑与保证。

马泰·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幅面孔》中指出:“区分古代与现代似乎总隐含论辩意味,或者是一种冲突原则。……现代性话语强调的是前现代社会与现代性之间的非连续性。”^[20]具体到中国这样一个非西方社会,对于其中所蕴含的传统因素,尤其是传统家族,很多学者认为是与现代性的本质相悖并阻碍了现代化的发展的。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认为,现代化需要个人的坚强动机、敢于冒险、创新、能自由迁移等特质的配合,但中国的传统家族制度却妨碍这些特质的发展。韦伯(Max Weber)认为中国的传统家族过去重视家族关系,中国的社会关系结构最终凝结在家族关系中,而中国的家族关系结构又只为儒教强调孝悌而无比地强化,其实质是血缘关系和人身依附,而现代性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展开所要求的正是要以打破血缘关系和人身依附为前提的。在采用传统、现代的概念去描述转型时,在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和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的影响下,很多研究言及中国缺乏突破自身发展框架的内在动力,因而社会模式停留在低端循环之中,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只有依靠西方所带来的外力冲击、依照西方模式演变方可完成。

诚然,传统家族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与外源性、引入性的现代因素两不相容。

但传统与现代两分法只是一种理想典型,它的认知受限于它采用了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特定尺度来确立中国的变化是否有价值。“冲击—反应”虽有其特定价值,但无视被研究者的特殊性,限定了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的模式。重新审视后我们发现,对于现代性的讨论应突破单线程、二元认知的框架。晚清与现代的断裂说已被中外学人深入反思,“没有晚清哪有五四”命题的提出,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儒家伦理蜕变成新形态的细致梳理,以及国内学者汪晖对传统儒学在近现代过程中“活的亦即构成性力量”的研究,均指出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现代与传统一脉相承的内在演进理路。“如果不能逐步从自己的文化中爬梳出一些适切的现代语言和概念,恐怕很难真正把握传统文化的特征及其现代涵义。历史一再显示:仅诉诸西方文化以解释中国文化,其结果,则令中国文化沦为西方文化的万花筒,到处都可以看到西方文化形形色色的迹象。”^[21]

张武龄家族的转型在实践层面上证明了传统家族超越制约进行现代转型的可取性。张武龄家族在强烈的外力冲击下选择转型,表现出强烈的进取欲望,渐向近代新式文化靠拢,传统家族也由此获得了重生,进入了一个文化家族自我成长的过程。事实上,由张树声一代所萌发的近现代意识和开明的家风都为此次转型埋下了伏笔:张树声在《遗折》中曾批评洋务运动是“遗其体而求其用”,提出“勿以游移而误事,勿以浮议而隳功”,应“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22]张树声以重臣之身份有如此超前性和远瞻性的认识,对家族后世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合肥四姊妹》的译者杨早将张家的家族精神概括为“创新但又守定”,认为所谓守定正是从传统而来,体现在每位家族成员内在的世家气质上。在民国这样一个多种价值观并存、充满着无数可能性的时代里,张家的家族成员又以创新作为他们的行为模式,突破了所在阶层的生活窠臼,选择了可能不为大众所认同的道路。并非所有的显宦家族都能成功的转型,也不是任何旧事物都能适应社会的变化,张武龄家族在动荡与不安中坚守着原本的选择,体现了从淮军时代就留存的精神传统——不拘一格却又能走出自己的稳定道路。张武龄家族之所以完成现代转型,其原因就在于它的内外的相互协调,产生了顽强的再生力,它对环境条件的适应性,对现代文明的互化性和包容性,以及思维方式上的开放、实用理性,无不与此有关。家族的这种自我调节,唯有根植于对外、内部的清醒认识方能生生不息,失去了时代接榫点,缺少自我修复与调整活力的传统家族,是无法长存的。

张武龄家族转型是由传统趋向现代,并不存在与传统本质上的断裂,而是传统与现代交叠粘连,从而呈现出过渡性的特点。张武龄家族在转型中并未将传统与现代对立开来,而是从自身出发肯定传统文化的存在价值。当时的许多精英知识分子,如同后来五四时期所表现出的那样,认为只有克服、摧毁甚至彻底与传统决裂,才能获得现代的重生,于是自然将传统置于现代的对立面加以抨击。张武龄家族转型中的可取之处,在于将传统与现代并置,既展现了传统的价

值与功能,又提出了对现代的学习和思索,传统的未必是落后的,而现代也未必是先进的,关键在于如何在保持和发展传统优势的同时,着眼于中国社会内部,进行家族的自我发展。张武龄家族的转型既有对现代性的主动趋近,也有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呈现出对家族开放包容的心态。

注释:

[1]关于迁移时间,目前有1911年、1912年、1913年三种版本。张元和、张允和年谱中都有1911年迁沪的条目。但是张允和在不同文章中对于迁移时间游移不定:“辛亥革命后,一九一三年,父亲带全家搬到上海。那时我二十二个月,叫名(虚岁)三岁。”(《亲爱的父亲》);“辛亥年,革命的时候,我22个月,由合肥龙门巷坐船到了上海。”(《红双喜——我想我的好奶奶》);“一九一二年,全家来到上海住了几年。”(《万老师》)。张允和出生于1909年7月25日,按照举迁时“22个月大”的说法,迁移时间应为1911年5月,明显与“辛亥革命刚过”之说相悖。又,《合肥四姐妹》和张寰和回忆资料都有陆英合肥生下元、允、兆三女后得一男,迁移发生于失子次年的记录。张兆和出生于1910年9月15日,失子应在1911年,据此推断迁沪应发生在1912年间。另外,四女张充和1913年5月17日出生于上海家中,说明此时张家迁沪之举业已完成。目前虽无进一步明确史料,但张家的迁移发生在辛亥革命后,至张充和出生前的这段时间应该明确,根据目前的资料推断发生在1912年可能性为大。

[2]董治安主编:《两汉全书》第二十二册,《崔寔·政论》,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877页。

[3]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李鸿章传》卷六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8页。

[4]赵世昌:《合肥租佃制调查》,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五十八辑,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第29826页。

[5]翁飞:《安徽近代史》,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86-395页。

[6]谢国兴:《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安徽省(1860-1937年)》,台北: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91年,第74页。

[7]陈独秀:《安徽俗话报》创刊号,1904年3月31日。

[8][13]倪应:《张树声家世调查记》,收录于《肥西淮军人物·肥西县文史资料之三》,黄山:黄山书社,1992年,第8、7页。

[9]王道:《流动的斯文——合肥张家记事》上册,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14页。

[10]李鸿章:《张荫谷墓表》,收录于《肥西淮军人物·肥西县文史资料之三》,黄山:黄山书社,1992年,第15页。

[11]张金龄编:《合肥张公荫谷后裔谱资料汇编》,2005年,第7-9页。

[12][美]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章克生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0页。

[14]韦布:《乐益女中校刊·序言》,1932年。

[15]张允和:《曲终人不散》,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1页。

[16]引自同治十三年(1874年)张树声所作《重建紫阳书院记》碑文。

[17]《光绪续修庐州府志》卷17,《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2》,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83页。

[18]张允和、张兆和:《浪花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6页。

[19][美]金安平:《合肥四姐妹》,凌云岚、杨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91页。

[20][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幅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0页。

[21]黄进兴:《优入圣域》,中华书局,2010年,第18-19、71页。

[22]张树声:《张靖达公奏议》卷八,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刻本,第32-34页。

[责任编辑:陶然]